

# 我在文化多元的云南

□范 稳

首先申明,这个标题有些套用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我在暧昧的日本》。这可能只说明一个问题:作家的创作与他的生存环境相关。

云南这个环境本来与我的生活无关,但20多年前我从四川来到云南,在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应该说就爱上了它。那是一种朦胧固执的爱,就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小伙子爱上了邻家的漂亮姑娘,并不知道该怎样去爱,只是因为人家身上具有一种神秘的魅力。

我决定到云南工作生活,源自于一个文科大學生的作家梦。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单纯的时代里,作家绝对是一个让人敬仰的职业,好像没有比当一个作家更让人感到自豪的了。那时候的万元户已经牛得不行,但人们看他们时总是一种鄙夷的眼光,而官员也不像现在这样趾高气扬。那时的作家就像当下演艺界的“超男超女”一样受人追捧,因此,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的科班文青,不去当作家,简直天理不容。

但我希望当那样一种类型的作家,譬如海明威,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忽而在非洲打猎漫游,忽而正在西班牙打仗斗牛,老了又在加勒比海隐居钓鱼。中国的作家当然没有那样多的自由和勇气,但云南似乎提供了某种浪漫神奇的可能,至少比我要在家乡四川强。

就这样,我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地域跨越。我认为没有跨越的人是不会太有出息的,不管你是在哪个方面作出的跨越,你总得迈出那关键的第一步、与众不同的一歩,不论是在月球上走出的第一步,还是独自背上行囊离开家门。

那关键的第一步可能就是我们常言所说的人生转折点吧。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转折点,或改变了命运,或重新认识了生活,换了一种活法。尽管人生没有假设,但人活到一定岁数,经历了更多的磨砺,总会难免在夜深人静时想:如果当初我不这样,会不会现在更好?比如我也会扪心自问:这辈子不选择当一个写作者的话,是否会活得更轰轰烈烈?云南的文化资源虽然很丰厚,但它的文化环境却一直不尽如人意,如果你去某个文化中心或经济中心地区,是否就更如鱼得水?当然也会设想:是否会活得更惨、更不尽如人意?你去经商,但是失败了;你去当一名公务员,又时常哀叹自己丢了专业……

在云南的20多年我几乎只做成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写作;我也只算是初步实现了一个梦

想,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我越来越坚信:上帝让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当一名作家的,尽管它已经不是当初梦想中的场景了,尽管作为一名身处边地的作家,你得付出更多,并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困难。

其实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当下状况作出评判:你做过的事情怎样,你将要做的事情又是否符合当初的理想。人在江湖,可能只有最原始的理想才是最单纯美好的,就像你的初恋恋人。你这一生可能爱过很多人,但初恋总是最难忘。爱一个人如此,爱一桩事业大约也概莫能外。

因此,眼下我只有庆幸,庆幸自己当初对这样一个地方的选择,更庆幸在这个文化多元的地域对文学的坚守。除此以外,我不能不再对这片收养了我的土地回报更多。至今我也认为,还有关键的一步我幸运地走对了,那就是作为一个只拥有汉文化背景的汉人,我完成了一次文化跨越,走向了灿烂多元的民族文化。云南有藏族、纳西族、彝族、哈尼族等众多少数民族,它为一个作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盛宴,一个如饥似渴的写作者怎能拒绝呢?

我不是一个待在书房或者定居在一座城市就可以写作的作家。在2000年以前,我也曾经在这样的状态中写过,但似乎都在重复别人,更重复自己。我没有那种从一滴水就可以观测到大海的睿智头脑,我需要投身到大海中,才感受得到海洋的广袤壮观、海浪的潮起潮涌。更何况,我已经站在海洋一样博大宏阔的民族文化里了,焉有不下海畅游之理?

感谢这些博大精深而又充满神奇魅力的民族文化,它们为一个写作者提供了广阔丰沛的文学土壤,也为作家提供了想象力飞升的平台。这是一片多元文化并存的大地,多种民族、多种信仰在一个发现者眼前像万花筒般呈现。我看到的是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信仰和信仰的砥砺和坚守,我知道这很精彩灿烂,是一片文学的沃土富矿。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他的发现和诠释既应该具有文学意义,又必须尊重并敬畏那片土地的历史与文化。在云南这片神奇瑰丽的土地上,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旅行者,我为肩负自己的文学使命而来,我渴望被一种文化滋养,甚至被它改变。

惟一的途径便是虚心下来,像一个谦卑的朝圣者那样,走上那条探寻与发现之路。这些民族

文化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我可以用心去感悟。在村庄和雪山下,在寺庙和教堂里,在青稞酒的浓烈和酥油茶的浓香中,在歌声与诵经声中慢慢体味他们的魅力。记得我刚进藏区时,和一群新认识的康巴兄弟喝酒,一般的结局是我醉倒在桌子下,他们还在唱歌跳舞,现在我能自豪地说,我可以和他们一起歌唱,一起醉倒在桌子下了。当我学会像藏族人那样把一座圣洁的雪山视为神山时,当我能理解并尊重一个村庄的习俗和村人们日常生活中彰显的信仰力量时,我方觉得我正在走近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说、神界与现实。

在我们的民族大家庭里,每一个民族——哪怕他人口再少——都是一部大书,都有自己的文化生态体系和文化传承方式,也就是说,都有文学能够滋生的土壤。遗憾的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认识能力太有限;更遗憾的是在这个市场经济无孔不入、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的时代,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仿佛在一夜之间踪迹全无。现在云南的不少民族地区,如果不是赶上民族节庆的话,你就既看不到它的文化传承路径,也看不到它的体系特征,甚至连民族服饰、民族歌舞这些最外在最简单的文化元素都看不到。只有到了他们的节庆时,你才能看到祭司、巫舞、祭祀、人格化的神祇、人和神的欢乐等人类童真年代的元素,你才能看到寨神、树神、水神、火神、田神、兽神、土地神等这些隐匿在老人们的传世歌谣深处的神祇。这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它们原来一直离我们很近很近,而这个民族似乎也活回来了,民族文化传承其实并没有丢。这就像只有在过年和中秋的时候,我们才特别强烈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感。

面对时光的冲洗,面对历史的车轮,一个作家其实也很无奈。我一向认为,作家创作精力最旺盛的阶段,也许就只有十年八年的,这就像一个运动员有他出成绩的黄金时期,过了那个阶段,他跑不快也跳不高了。我认为作家其实也一样,不可能永远都处在巅峰状态,状态不在了,你打鸡血针也不顶用。这是生命规律,也是创作规律,我们大家都得尊重。我为自己感到庆幸,用自己最充满勇气和创作激情的十多年做了一桩有意味的工作,把“藏地三部曲”奉献给我的读者,供奉给这片神奇的土地。这就算是一次人生的感恩吧,因为面对雄浑壮阔的莽莽大地,置身丰沛多元的民族文化,我常常感到自己才尽词穷。

## 桃李天下

### 东篱

近日获得“河北诗人奖”。东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出版有诗集《秘密之城》。

东篱诗歌创作的精神坐标,就是以自己的文字,来丈量语言与情感之间的距离,来平衡诗歌与思想之间的高度,以胸中笔墨观察社会、洞悉时代。在早期创作中,诗人钟情于生养自己的油葫芦泊,熟悉那里的一



山一水、一草一木,因此在抒写中,其言偏于乡野之风趣,其情动于时间之流逝。近年来的几组诗,像《唐山风物》《南湖写意》等,诗人将视野转向了对地域性场景的认知和书写,这是他创作历程中一个持续的命题。对地域文化的守护,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诗人应该担当的责任,东篱试图让自己在这方面写得更自然、更精进,展示了他独有的诗性气质和温润之气。

### 郑小驴

近日获得第26届(2010年度)湖南省青年文学奖。郑小驴原名郑朋,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曾在《十月》《山花》《花城》《天涯》《青年文学》等期刊发表小说等作品80余万字,出版有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和长篇小说《西州曲》。

郑小驴是“80后”作家里少数坚持独立思考、写作的作家之一。毕飞宇评价说:“郑小驴的小说一直在书写中国经验,在他



的小说里,本土是最为坚实的基础。然而,郑小驴的文本拥有强劲的实验性,这使得他的小说又显得十分生动。他的小说充满活力,假以时日,郑小驴会有相当可观的前景。”

湖南省青年文学奖设立于1983年,为湖南省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文学奖项,每年评选一届,每年原则上评选1人,最多不超过2人。作家韩少功、何立伟、王跃文等都曾获得这个奖项。本届获奖的还有青年作家周伟。

### 韩芳夷

长篇小说《伤祭》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韩芳夷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高研班学员,她的这部新作围绕外婆(林碧玉)、母亲(韩诗美)、晚(外孙女)三代女人来叙述韩家这个华侨之家的故事。外婆是文昌女人的样本,是历史的见证。她是韩家的灵魂,守着家园,生儿育女,侍候公婆,又眺望南洋。母亲不愿嫁到南洋,离家出走,又因家庭关系复杂,被迫与



初恋的男人(张北)分手。与父亲林海结婚,婚姻生活却并不顺,一直与之过着彼此分居的生活。后来爱上丁力,却不能与他结合。晓因母亲婚姻的不幸,恐惧婚姻,不愿结婚。外婆的去世,改变了她们的想法,她们对以往的生活进行反思。她们在恨与忧伤中挣扎,又在爱和宽恕中走向平和。小说刻画了这群文昌女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对文昌女人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艺术性的描绘。

### 怡霖

第三部散文集《追梦霞满天》最近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怡霖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她在集子中表达了自己对真善美的追求。她善于从平凡生活中开掘出诗意与哲理,饱含着出自心灵深处的淳



朴而炽热的真情。她的散文有着一种“焰”与“美”的直接抒情,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了她持久的热力和绵长的光度。张胜友评价说,任何虔诚的文字都是有“焰”的,怡霖的散文之“焰”朴素、真挚,会融化人,但不会焚毁人。

### 王宗坤

长篇小说《新闻部主任》近日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王宗坤是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他有15年的电视新闻从业经历,对整个的电视新闻链条有着较为深刻体验,本书正是这些体验的产物。

小说以秀水电视台新闻部主任沙镇玉对新闻理想的求索为主线,写出了他的抗争与无奈。面对种种可怕的新闻生态,沙镇玉丝毫不退缩,他利用新来的



局长急于出政绩的心理,提出了打造民生栏目、重树新闻形象的构想。同时他巧妙利用记者路长达与秀水市领导之间的矛盾,揭穿了“抢名人风波”的闹剧,完成了一个真正新闻人的使命。但最后他却代人受过,成了一位在机房值班的夜行者。

小说以扣人心弦的故事、细腻犀利的笔触、入木三分的刻画,真实再现了新闻人的奋斗与挣扎、正义与私欲,笔锋直抵人性幽微和情感隐秘之处,读来令人震撼、发人深省。

### 鹤蜚

小说集《土豆在飞翔》近日由大连出版社出版。鹤蜚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她的这部小说集收入了中短篇小说《飞来的子弹》《曾经》《阳光下的怀古》《最后一批难民令我黯然神伤》等12篇作品,是鹤蜚近年来发表在《中国作家》《青年文学》《钟山》等期刊上的作品。其中《理查德·佩帝的诊断》获得了2010年度《小说选刊》全国首届小说笔会征文短篇小说一等奖和大连年度十部有影响的作品奖。鹤蜚的小说写出了浮世尘埃,穿透生活的表象,抵达丰富的人的内心世界。



鹤蜚的小说写出了浮世尘埃,穿透生活的表象,抵达丰富的人的艺术品质。



魯  
鎮

书海一瓢

# 死神像婴儿般突然降临

□鲁 敏

英国作家吉姆·克雷斯有一部小说叫《死》,这名字有些犯忌——据说当初让出版商们闻之“都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甲”。故事一句话就可说清:一对人到中年的动物学博士夫妇,来到了30年前他们初次相遇的海湾,正当他们准备重温旧梦之时,意外遭遇了杀害。

小说妙在吉姆·克雷斯的角度。除了常见的情感线故事:追叙这对死者腼腆平淡的恋爱与婚姻,以及女儿对失踪父母缓慢冗长的搜寻之旅,我个人最喜欢另一条推进线:在他俩死后却仍未被发现的这6天中,在甲壳虫、海鸥、

苍蝇、螃蟹、海水、各种食腐微生物及尸体本身化学分子的参与下,这对曾经带着体温、欲望、智慧、虚荣、忧虑的尸体开始腐烂衰败,向死亡的最深处迈进。

这些章节是纯白描的,带着放大镜般地仔细入微,甚至融入了许多生理解剖、海洋生物学、昆虫学等专业术语。他的笔调出奇的冷淡乃至戏谑,在这里死亡仿佛成了一场大自然的盛宴,每个参观者都感觉到一种顺水行舟、春夏来般的平静与安详,就是这对失去肉体的博士夫妇,似也因此获得了无上的升华与永恒。

尤其清新可喜的是,无论是女儿还是作者本人,对于追捕谋害这对动物学家的凶手,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本书惟一的主题就是死亡——死神是另一种新生,它像婴儿般突然降临,在接近爱怜的注视中,生者因此获得双重的爱与责任。

作者吉姆·克雷斯在国内似乎并无甚名气,我试图找过他别的翻译作品,未果,或者说,我找得并不坚决。

对他的阅读,我更愿意止步于此,这也是对《死》致敬的一种方式。

我的鲁院

# 再忆鲁院的日子

□谭旭东

时间过得真快呀!2005年到现在,一眨眼就过了7个年头,而我们首届文学理论评论家高研班的同学,有好几位年岁已经过了半百,班长段崇轩和党支部书记杨宏海都退居二线了,而我也过了不惑之年,两鬓染上白霜。

首届文学理论评论家高研班,实际上就是鲁迅文学院第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同学们都简称“鲁五”。我们这些“鲁五”的同学都难以忘记那一段美好而充实的学习时光。现在鲁院高研班已经办到第十七期了,估计我们“鲁五”是时间最短的一个班,进修学习的时间仅为两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如果大家不积极地进行交流,彼此之间不会留下太多的印象,但当我们从鲁院结业后却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为那时候,鲁院的老师们是那么用心地关照着我们。

中国作协的领导也很重视这个班的建设。我个人能进“鲁五”,就是高洪波副主席推荐的。他曾经专门谈到青年批评家的培养问题,并极力推荐我去参加进修以开拓自己的视野,所以我也是一个幸运儿。我当时还是个在读博士,且主要做的是儿童文学方面的研究,而“鲁五”的其他同学大都有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如段崇轩、葛红兵、刘忠、刘川鄂、高海涛、宋家宏、周玉宁、王晖、林超然、刘海燕等都出版了自己的批评集,在文学评论界引起了关注。

我虽然也出了一些书,但真正算得上理论成果的只有一本《当代儿童文学的重镇——李凤杰儿童文学创作论》。有一些人读到过,认为还可以,是一部值得一提的作家专论。但我心里明白,这本书不过是部尝试之作,与许多当代文学评论家的论著相比,还逊色很多。所以我当时想,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刻苦认真地学习,把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上去,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厚爱。

到鲁院报了名,发现自己的学号是第一个,心里一阵窃喜。走到二楼的201房间,发现隔壁就是葛红兵,旁边就是《文学自由谈》副主编黄桂元,还有写文艺随笔很老到的王双龙,和他们认识后,心里很有压力。推选委员会成员,段崇轩做了班长,高海涛担任副班长,刘川鄂和我做了协秘书长,那时候老段特别热情,有“老大”的风范,而刘川鄂对学术交流活动的组织很在行,因

此我们组织了好几次关于文学理论批评和长篇小说的讨论,每次会议都很热烈,不同的观点互相交锋。当时,我们还组织过同学曹有云的诗歌作品研讨,对他的诗歌有人给予肯定,也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但事后大家又乐呵呵地凑在一起,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

鲁院给我们开的课程非常科学。当时胡平老师担任常务副院长,副院长还有白描老师和王彬老师,他们为了把我们这一届的课程排好,花了不少心思。据说中国作协的领导对这事也特别关心,多次讨论审定课程表。所以,我们不但听到了前沿性的国际政治、军事讲座,还听到了一流的音乐、舞蹈课,当然还有一系列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课程。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吉狄马加、李敬泽、陈晓明、王彬等几位老师的讲座。这些课程对于开拓我的文学视野是很有帮助的,听课时我就想:要跳出儿童文学来研究儿童文学,要站在更高的位置上来审视儿童文学,这样才会生发出新的理论火花,结出灿烂的果实。

当时我正在做博士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没有囿于常规,也多少与在鲁院学习的体验与思考有关。我尝试着把儿童文学融入到整个文学体系、纳入到当代文化环境中来论析,后来写出了论文《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经过两三年的修润,这篇论文得以出版,并荣获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我想,这是我在“鲁五”学习的一个大收获,而不知内情的人不会知道,这个奖和“鲁五”有着某种思想的联系。获得这个奖后,高洪波、胡平、白描和王彬等几位老师都给了我很高的评价。鲁院的老师们说:“感谢鲁院,感谢扶持我、帮助我的每一位老师,也感谢‘鲁五’的同学们给予我的启发。”

“鲁五”这一期,算是鲁院的文学理论评论的“黄埔一期”吧。我们这50多位同学从鲁院结业后,陆续出版了很多研究成果,成长脚步也都很快。后来,高海涛做了《当代作家评论》的主编,王晓莉做了《创作评论》的主编,王双龙则是《文艺争鸣》的主编,孔海蓉当选了贵州省作协的秘书长,何英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的理论室主任,葛红兵、刘忠和王晖都做了博导。

鲁院现在搬到了新居,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一个大院子。鲁院的老师也有一些变动,如胡平老师后来调任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王彬、礼平等老师退休了,成曾越和施战军两位老师担任了副院长,陈涛等几位年轻的老师也加入进来。可能“鲁五”的部分同学还不太知道这些信息,也还没参观过鲁院的新居,但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南里那条小巷里的鲁院还深深印在他们的脑海里。那里,留下了我们“鲁五”同学们的欢声笑语,留下了我们思考的神态,留下了大家互相交流的火花。那个院子里的白玉兰的芳香,小猫咪的叫声,乒乓球在桌边的跳跃,还被有些同学写进了散文里。

说鲁院是一棵大树,是不为过的。从它最早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再到“鲁迅文学院”的名字变迁,就可以找到它厚重的历史足迹。一代代文学宿将与新军,撑起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片绿荫。它们给了这些热爱文学并立志于有所成就的人一片安静的角落。鲁院的日子,没有苦涩,只有甘醇;没有灰色,只有灿烂。我们这些“鲁五”人肯定会从成熟而渐渐变老,但鲁院这棵大树不会变老,它会不断地迎来新的力量,它会给文学带来更多鲜活的氧气和种子。

鲁院的美好日子,虽然短暂,但它长留在每一个“鲁五”人的心中,也留在我信心满满的憧憬里!